

重估电子民主：概念、分歧与研究进路

李亚好，杜骏飞

摘要：当代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社会形态、行为方式及思维理念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理论界有关新媒体技术与民主之关联问题的讨论仍纷纭庞杂，缺乏系统性的思考与关键的理论创见。相较于其他近似概念，“电子民主”更具包容性和指向性地显现新技术环境下参与式民主的媒介化本质。电子民主的研究路径主要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和公共领域理论视角下展开，这两种路径同时存在决定论和选择论的分歧。基于系统性对话，本文尝试弥补这一分歧，提出了“弱关系社会”和“公共知识”概念：前者阐释了新媒体技术所塑造的新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动力问题；后者阐释新媒体技术所催生的新公共商谈图景，及其所昭示的民主价值。以此观照电子民主的实践问题，其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变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电子民主；社会资本；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0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6)04-0092-11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4.012

“政治哲学中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无疑是民主，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无疑也是民主，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无疑还是民主。”^{[1](P123)}千百年来，政治哲学的光谱波云诡谲，有关民主的理念和价值却始终历久弥新，其理论地位堪比政治“神话”。“各种各样的观念、主张、行为及制度安排等，都纷纷贴上民主的标签，以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与正当性。”^{[2](P51)}在民主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取向的精英民主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取向的参与式民主主义等流派的纷争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把握到民主理念的当代共识，即人民的统治。基于此共识，民主取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愿意否认其政治制度及其安排的民主合法性。然而，在涉及“人民”是“谁”、主权与治权可否分离、主人与主事如何相得益彰等问题时，“民主就赫然成为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并在民主指称被越来越多的具体演绎和修饰语叠加的使用中摇摆于贬义与褒义之间成为最被滥用的一个，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民主反对民主的尴尬对峙局面。”^[3]因此，我们认为，在理解和思考民主问题时，应当厘清民主概念的边界，不在众多修辞之间摇摆不定，确认民主理论谱系中的对话者，从其理论情境中寻找新的理论发现以及具有解释力的新视角。本文对电子民主的探讨便循此思路，先梳理电子民主的概念及其相关概念丛；其次分析有关电子民主的已有争论，重在揭示这些对话所产生的理论情境，并与之对话；再者，从此番理论对话中选取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视角探讨电子民主，尝试用新的理论工具对电子民主进行评估。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985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网络传播史（1994—2013）”（NJU985XM06）；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意识与社会抗争”（2013CW04）

作者简介：李亚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电子民主:技术变革与民主的新问题

(一) 概念辨析:何为电子民主?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媒体技术在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全面推进,媒介技术的革新对人类社会形态、行为方式及思维理念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每一次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期待和担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到来尤其如此。其去中心化和反控制性的技术禀赋,与民主问题具有先天性的亲和力。它首先改变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却给政治家的思考注入了极大活力,激发对“更优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一系列探讨。网络政治、网络民主、数字民主、电子民主、远程民主、虚拟民主等概念纷纷涌现,“构成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道新的风景线”^①。

甫一出现,电子民主相关的概念丛便很复杂。1981年,美国学者台德·贝克尔在《电子民主:将权利归还于民》一文中最早提出可以用电子民主作为手段来推进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紧接着,本杰明·巴伯教授于1984年出版《强势民主》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从批判精英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强势民主”这一概念,主张用电子民主激活社群意义上的新型参与式民主,深化了电子民主的理论内涵^②。1995年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提出了网络民主的概念。1996年,美国学者格雷姆·布朗宁在其专著《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一书中再次重申电子民主。相类似的概念还包括诺里斯在1999年提出的虚拟民主^③,汉克等提出的电子民主^④。

这些主语相似而定语不同的诸多概念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差异。从面上观,其回答的问题也似乎各有不同:或是研究政治民主问题,聚焦电子治理、信息沟通、公民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新政治参与形态;或是研究经济民主问题,关注信息产业的竞争与垄断、技术资源的开放、数字鸿沟等;或是研究社会民主问题,如在线教育、政治连贯性等^[4]。然而,究其根本,我们可以看到其共性问题,即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的新型参与式民主。换言之,这些概念的主语落脚点重在政治民主这一层意涵。由此,我们厘清了电子民主及其相关概念丛的基本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的是,相较于其他概念,为何电子民主这一概念能代表此种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的新型参与式民主而被更加广泛地承认。一言以蔽之,“电子民主”可以更具包容性和指向性地显现新技术环境下参与式民主的媒介化本质:“电子”较之于“数字”、“网络”等概念具有更广阔的外延,较之于“虚拟”、“远程”等概念则凸显媒介性。这可以通过英国汉萨德学会(Hansard Society)对电子民主的定义得到直观体现。

电子民主的定义与拓展政治参与的努力相关联,通过新信息和交流技术使公民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相互联系^⑤。

① 参见胡伟:《网络民主:机遇与挑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稿》,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800.html。

② 参见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之不同,克里斯托弗·阿特登则使用了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这一概念来探讨类似的问题。参见Arterton,F. Christopher. *Teledemocracy: 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7。

③ 参见Norris,Pippa. *Virtual Democracy. Press/politics*,1999,Vol 3,Na 2,pp 1-4。

④ 参见Hacker,K.L.,J. Van Dijk (eds.). *Digital Democracy: Issue of Theory and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 Ltd 2000。

⑤ 参见Hansard Society. “E-democracy Program.” Hansard Society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hansard-society.org.uk/edemocracy.htm,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3. 原文如下:“The concept... is associated with efforts to broad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enabling citizens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ir representatives via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译文见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另一权威性的定义由电子民主实践先驱者之一史蒂文·克里夫特提出,他认为“电子民主意味着在今天的代议制民主中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其他技术进行的更多的和更积极的公民参与,也包括公民以更为直接的形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①。根据这两个权威定义,电子民主的内涵主要指各种民主主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民主运作、增进民主参与、完善民主治理的过程,既包括直接民主的形式也包括间接民主的形式。同时强调将信息技术视为促进民主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组织对个体、公民对组织两个维度^[5]。从类型学来看,电子民主的分类法含两重维度。在媒介属性维度上,电子民主可分为电视民主和网络民主,尤以网络民主为主;在参与性维度上,电子民主可分为电子官僚模式、信息管理模式、民粹主义模式和公民社会模式^②。国内学者在综合西方电子民主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电子民主的类型分析框架^[6](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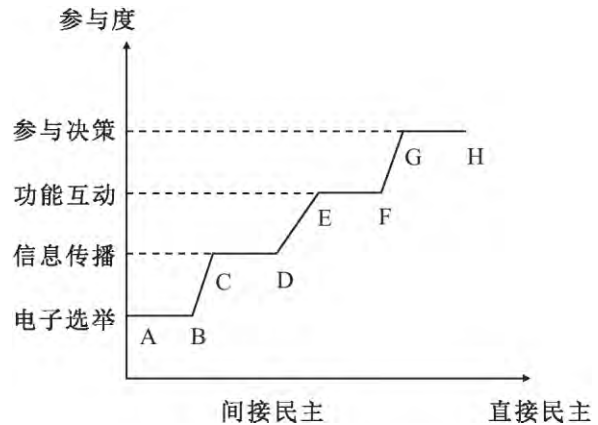


图1 电子民主发展模式示意图

对此,我们还可从中将电子民主的核心内涵解析为两个要点:

1. 在承认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强调电子民主的直接参与性,以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西方民主理论经历了古典时期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近代启蒙时期以精英治理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现代时期为修复精英民主主义的弊端而提出的多元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以及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提出的协商民主,此外,还包括左翼人士倡导的激进民主。在这条不断实施、抵抗与修正的民主理论光谱中,电子民主的位置处于参与式民主的范围之内。在此意义上,电子民主的对话者是代议制民主,并与卢梭式的民主原教旨主义区别开来,是参与式民主在新信息技术时代的具体演绎。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首次系统论述了“以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理论”^{[7](P104)},将参与式民主视为治疗自由主义民主诸多问题的方案。而后,本杰明·巴伯在八十年代提出了“强势民主”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新型的以现代公民为主体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在参与式民主论者看来,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次优”安排——代议制民主正在远离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弱势’民主理论,其民主的价值是谨慎的,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它服务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企图与私人目的”^{[8](P4)},使得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越来越被精英集团所操控,丧失了公共性。为了“疗救”代议制民主的弊端,参与式民主论者尤其是巴伯基于社群主义的相关理论提倡以公民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这种民主模式在承认个体偏好的前提下,强调以社群或社区为单位的参与、对话和共识,实现公共事务上的互利合作。为此,巴伯还设计了一系列用以保障强势民主的具体制度,如电子化的镇民会议、电子投票、全国性的公民通讯合作组织等电子民主方案。参与式民主论者早期对电子民主的相关论述奠定了电子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框架:在微观上,电子民主关注社群或社区,重视研究和培养社区参与;在宏观上,电子民主立足于公众的政治参与,修正和回应代议制民主的理论不足和现实缺陷。

2. 强调此种参与式民主的媒介化,即媒介化的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交往和对话。几乎每一个民主论者都会承认古希腊式以城邦公民为主体的直接民主既是民主的原初模式也是最优模式,但

① 参见 Clift, S. digitaldivide <http://mailman.edc.org/pipermail/digitaldivide/2004-October/000379.html>。

② 参见 Glen Segell,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UK 2001 Election, Glen Segell Publishers, 2001, p6。

此种模式受制于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 仅适合于具有同一文化属性、地域范围较小的政治共同体。因此, 在近代启蒙时期, 以洛克为代表的代议制民主最终得胜于卢梭式民主原教旨主义, 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现实安排。将主人与主事相分离、选举权和治理权相绑定, 对于现代大国治理而言, 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然而, 不管是从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 现行的代议制民主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在哲学意义上, 代议制民主隐含性恶论的先验性判断, 既恐惧群聚且无判断力的大众, 又担忧逐利的精英集团, 在此意义上, 它确实类似于一种“动物管理”的政治模式。如巴伯所说, “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关注个人自由, 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 只是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 将人们安全的隔离开来, 而不是使他们富有成效地聚合在一起”^{[8](P5)}。此种解释可在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困境中找到相应参照。在现实问题上, 代议制民主愈加遭受指责, 一方面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积极, 政治冷漠现象加剧, 另一方面是选举政治常因政治经济因素而倍受诟病。媒介技术的革新似乎为现代大国治理带来某种民主可能性。通讯网络的全国性覆盖、多元信息的共享交互、扁平化的社交网络格局等都为公民的直接民主注入新的活力。当人们逐渐强化了媒介化生存的时候, 媒介化的民主生活理应成为民主论者的对话主题。需要明确的是, 此种媒介化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在微观上关注具象的社群与社区研究, 其理论抱负却指向宏观上抽象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电子民主论者来说, “公共领域的核心力量在于, 公民在交流的自主领域中能够自由参与理性辩论, 远离国家、大媒体公司以及侵犯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控制与影响。”^{[9](P117)} 公共领域的理论蓝本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具有先验性的契合能力。

(二) 从社区到政治: 实践中的电子民主

电子民主的研究活力不仅局限于学术界, 它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吸引着众多的实践者和先驱者。这些实践项目在初期往往局限于地方性的社区网络, 如北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社区记忆项目、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城市项目、南加利福尼亚的斯塔莫尼卡公共电子网络、西雅图社区网络等。这些社区网络发展迅速, 成员以地方性的城市居民为主。希望借由社区网络增进地方性社区公共参与是这些电子民主实验的公共目标。实践结果却难免令人遗憾, 在社区网络、社会资本、公共参与以及政治参与四个关键因素的关联性上, 实践者与研究者很难获得共识。这些实验项目所展现的公共参与的非政治性无法为专家们的预设提供足够多的证据支持。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电子民主的现实面貌已经大为改观, 用安德鲁·查德威克的话说, 即实现了从社区到政治的质变。这种质变意味着: 从参与行为来看, 电子民主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再流于非政治性的日常社交, 政治层面的公共协商行为正在培养和强化; 从参与广度来看, 随着社区网络的地域扩张, 电子民主的参与者们不再仅限于关注和讨论本地事务, 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成为他们的日常关注主题; 从参与规模来看, 基础通讯设施的完善为社区网络的地域扩张提供了物理条件, 越来越多的小单位的社区网络也互联在一起, 形成规模庞大的公共交互网络; 从参与层次来看, 电子民主的参与性质逐渐从早期单一的电子选举和信息传播发展为以咨询模式和协商模式为主的多元多面向的政治参与模式。体现此种变化的代表性电子民主实验是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项目。该项目致力于避免正规政治机构的干扰、为公民的政治协商提供自主空间, 同时试图将这个空间嵌入正式的政治程序, 并产生了积极而明显的现实影响。

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项目显现了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参与式民主的现实可能性。提供这种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社区网络的自主性、公共参与的日常教育、分享精神的常规培养。这些因素通过辅助性条件, 如技术支持、精英支持和政府支持等有助于社区民主。

(三) 对电子民主概念的再思考

电子民主理论的产生以及电子民主实验项目的开展有其特定背景。分析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电子民主的理论内涵。

从现实层面来看,电子民主肇始于上世纪末,这与当时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民主化浪潮相对应。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普遍遭遇信任危机,代议制民主的低效率、反应迟钝、歪曲民意、精英政治、腐败问题、传统的责任保障机制失灵以及与其相应的庞大的财政支出等越来越引起公众和学者的不满^[10]。到上世纪末叶,这种不满随着新技术的革新而找到了重要突破口。电子民主逐渐成为专家和公众批判代议制民主的一大理论武器。但是,此种挑战是有限度的,没有突破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承认代议制民主的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巴伯用“强势民主”对“弱势民主”的挑战,不是要用电子民主为代表的参与式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现有不足,渡过其现实危机。这种前提意味着对电子民主的分析始终存在一个参照系,这在西方国家是代议制民主,在东方国家如中国则要另当别论。

从理论层面来看,电子民主所凭借的哲学资源主要来自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巴伯在《强势民主》一书中便大量谈到了社群、共识、互助等字眼,并将基于社群的互助行为和共识形成视为强势民主的重要保障。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论争对象为新自由主义,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是双方的关键分歧所在。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多以新集体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集体价值、公共善和公共美德。因此,西方对电子民主的论述也多隐含着这一相关判断,或者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个人与集体、正当与好等关系的讨论。这一问题因网络社会的新结构而变得更加复杂。故而,从技术对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影响出发,分析网络社会所建构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乃是电子民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进而研究网络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善是否以及如何与社会的公共善相包容,则是电子民主研究的深层次问题。

二、电子民主何以可能:决定论与选择论

电子民主在其发展初期经历“蓝天(blue skies)时期”,此时人们更多地沉浸于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鲜感之中,对此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有着诸多憧憬和设计。故此,瑞秋·吉布森等人将这段时期成为“美好的‘蓝天’时期”^①。随着电子民主实验项目的推进,学者们和实践者们在寻找积极论据证明电子民主的同时越来越力不从心,分歧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数据产生了差异迥然的结论。乐观主义者坚信新技术的应用会更加促进和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质量,而悲观主义者则担心新技术难免让少数人左右和操控大众的情绪,甚至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电子法西斯主义”以及“情绪性民主”^②。透过这些纷争的问题表面,我们可以看到电子民主之争的根本性问题,即技术和制度究竟有何关联,是技术形塑制度,抑或是制度选择技术。在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决定论、非决定论 and 选择论^[11]。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决定民主的发展,包括技术乐观论和技术悲观论。前者认为技术促进民主,如本杰明·巴伯;后者则认为技术阻碍民主,如帕帕查瑞斯(Zizi Papacharissi)^[12]。非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属性不同,技术只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不具有决定作用的一种因素,二者之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选择论认为技术之于民主的影响,取决于其存在的政治制度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属性、使用人群、使用目的等都将使技术对民主产生不同影响。就学术界现有关于电子民主的争论来说,分歧主要在于决定论者和选择论者。双方在理论交锋时常聚焦的理论概念有两个——社会资本和公共领域。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划分出电子民主论争的两个“战场”。

① 参见 Gibson, R. K., P. E. N. Howard, S. Ward. Social capital,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four-country stud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0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anada, 2000.

② 参见胡伟:《网络民主:机遇与挑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稿》,同上。

(一) 电子民主与社会资本: 从“强关系”到“弱关系”

技术之于民主, 难免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发生作用。不论是决定论者还是选择论者都无法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论证技术与民主的直接性关系。二者在究竟是技术决定性地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 进而决定民主的发展还是民主制度及其相关因素限制着技术对民主的影响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社会资本便是决定论与选择论易生龃龉的一个讨论范畴。它是介于媒介技术与民主之间的一个关键中介变量。在研究技术与民主两个抽象概念的关联时, 利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也有助于实证研究者实现研究的操作化。同时, 电子民主在实践层面也是从社区网络开始的。这使得电子民主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电子民主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关于电子民主与社会资本的讨论可分为两种观点:

消极来看, 互联网是一种反社会的媒体。其理据是互联网减少了使用者构建现实人际关系的时间, 使之产生孤立感。此种观点对于社会人和社会化的判定指向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接触。帕特南等人认为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公民交往方面的差别并不大, 并指出利用中介沟通和面对面互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有显著不同, 需警惕这一差异对互联网潜力和平等接入的损害以及网络的巴尔干化^[13]。帕特森·克劳特也认为因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有差异, “技术本身作用”之外的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14]。这便是选择论的代表性观点。诺曼·尼和卢茨·埃伯宁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论证了这一观点, 研究结果显示, 互联网使用者是孤单和匿名的状态, 互联网可能强化社会的疏离感, 增强人们的失落感, 使之逃避到虚拟世界中, 降低社会资本^①。上述研究将消极观点从中立性的选择论拉向了决定论的一端。但更多的相关研究倾向于选择论。如马特·里斯伯特等发现, 政治知识和投票参与受到了互联网上的人际讨论水平的阻碍, 如社会资本^②。安娜贝尔·汉斯等调查了对政治网站的北美访问者, 结果显示, 因特网补充了网民的政治活动, 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参与水平^③。

积极来看, 互联网有利于增强社会资本。其理据是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更可能积极参与在线社区, 互联网中的生存有可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交机会。决定论者认为互联网可降低社交成本, 提高社交效能, 扩大个体社会交往的规模, 提升交往等级, 这些优势都能让使用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简妮·皮克林等认为, 社区网络改变着社会弱关系, 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弱关系的改变有助于打破垂直的等级、权力、血缘关系, 发展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15]。选择论者则认为这种可能性并非绝对化, 这取决于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动机和使用行为。使用者对待互联网的动机和习惯不一, 其卷入网络社会交往的程度不一, 相应地, 人们借助互联网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也是有差异的。孤立化的网络生存会减少使用者的社会资本, 开放性的网络生存则有助于增加使用者的社会资本。瑞秋·吉布森等检测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国的社会资本、互联网交往和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 发现在美国网络交往对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并无消极作用, 同时受互联网使用者自身和国家差异的影响, 网络交往对社会资本和政治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④。

两类观点的交锋激烈, 就现有的研究来说, 积极面的研究结论更占优势, 但消极面的观点也不

① 参见 Nie, N. H., L. Erbring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Stanford, CA: 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 2000。

② 参见 Schuefele, D. A., M. Nisbet. Being a citizen online: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ased end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7, No. 7, PP. 55-75。

③ 参见 Quan-Haase, A., B. Wellman, with J. C. Witte, K. Hampton Capitalizing on the Internet: Social contact, civic engagemen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 B. Wellman & C. Haythornthwaite (Eds.), *Internet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Blackwell 2002. pp. 291-324。

④ 参见 Rachel K. Gibson. (eds.), 同上引文。

无道理。决定论在构建电子民主的理论蓝图时极具想象力,而其理论演绎又离不开选择论。我们认为,在此番争论中,有一个重要难题需要思考,即在虚拟环境中人与人的接触是否可视为社会化?这一问题并非简单的是非题。在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虽然当下的社会交往以现实生活为主,但互联网的普及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社会的交往在多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互联网也可以想见。因此,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决非当下能做到的。

弱关系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考察视角。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发表的《弱连带的优势》一文中提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前者指同质性较强,以血缘、地缘、情感等传统因素为纽带的稳固型社会关系,后者指异质性较强,没有太多情感维系的松散型社会关系。他认为,与个人成就高低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关系,而常常是弱关系^①。基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帕特南在研究社会资本时将之划分为桥接性社会资本和黏结性社会资本。桥接性社会资本存在于异质的、“外向的、超越各种社会断裂的人群”的网络中。黏结性社会资本存在于同质的、“内向的、倾向于强化内部认同的人群”的网络中。前者对应的是弱关系,后者对应的是强关系^②。概而言之,弱关系理论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弱关系获取新信息、扩大信息库规模的功能优于强关系。

我们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可能不再以强关系为主导,而以弱关系为主导。这种前景看起来是在违背中国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即社会关系越紧,社会力量越强。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交往中,弱关系更有力量。理解这一观点有两个要点:第一,对社会交往关系强度的指标需进行重新界定。弱关系所说的“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维持弱关系的网络人群在物理层面上可能是弱的,但在心理层面上却可能是强的,人们通过情感、利益、认同等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局部的强关系;第二,从社会交往的规模层面上需重新理解社会关系的建构。在网络社会交往中,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点对点的社会关系虽然是弱关系,但在一定的社交规模中,总体的社会关系却是强关系。即,通过局部弱关系建构宏观层面的强关系。在此意义上,由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将使得科学的对话和协商更具可能性。

(二) 电子民主与公共领域:从公共讨论到“公共知识”

电子民主与公共领域理论具有天然亲近性。参与式民主论者在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同时,需要提供修正性的理论观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他们常用的理论工具。公共领域的理论内涵包括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在应然层面上,公共领域是将个体与社会及国家联系起来的一种民主模式,这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对代议制民主具有批判作用;在实然层面上,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调节二者之间关系的特定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西方国家,政府权力和经济资本的扩张压缩了社会空间,公共领域逐渐或是已经萎缩,公民政治参与的独立性和活力逐渐丧失^③。此种悲观判断随着新信息技术时代的带来而发生改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的技术秉性,以及社交网络、公民新闻的现实发展让公共领域理论焕发生机。决定论和选择论在此问题上关注焦点是电子技术所建构的互联网络空间是否为公共领域。

在电子民主研究的“蓝天”时期,众多巴伯式的乐观者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以非线性的超文本为对话交往的载体,克服和避免了许多影响传统公共领域形成的障碍,为公众在

^① 参见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Gittell, R., A. Vid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③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网络上提供了广泛的自由表达空间,可以创建一个具有去中心化、理性、平等等特点的网络公共领域^[16]。消极来看,许多虚拟社区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标准——被私人 and 公共形式的混合力量施加了限制,如交流限制、商业限制、专业限制和政府限制。帕帕查里斯指出,互联网的资本化运营使网络媒体逐渐转变为商业性的媒体,这对于促进社会福利或民主实践几乎没有助益^①。皮特·莱文也认为网络有被商业异化的危险^[17]。桑斯坦更是认为网络参与者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易出现“群体极化”的问题,这不符合公共领域的理性精神^{[18](P44-49)}。

对于上述争论,可以借由拉比尔·波拉特的分析来考察。波拉特将网络政治的相关研究分为三个维度:作为信息资源库的网络;作为社交媒介的网络;作为虚拟公共领域的网络。在第三个维度上,又可细分出两条路径:一是研究互联网与拓展公共领域的潜在可能性,二是研究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讨论平台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19]。第一条路径的研究结果较为悲观,相关论点包括互联网并不是向每一个人平台开放,互联网缺乏建构公共领域的基础性要件——理性和一致性,互联网已经逐渐被商业资本所控制。此种不平等性、碎片化的结构以及商业控制使得互联网对于公共领域的拓展作用极为有限。多数决定论者在经历了“蓝天时期”的美好憧憬之后寻求实证论据时往往遭遇挫折,从乐观面转向了这种悲观论点。第二条路径主要讨论互联网、公共讨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得出的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有研究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公共参与和选举有正面影响^[20]。类似的观点还包括被道顿等对网络促进运动的研究所提供,他们的研究阐述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21]。对此,布鲁斯·比伯认为,若是武断地处理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夸大信息在政治环境中的功能,则很可能在实证研究中受到打击。因为这样的技术决定论忽视了信息被人们吸收并内化为政治知识的心理过程。他将这类研究概括为工具性模型。与之相反,若将政治兴趣、政治信任等个人情感和价值观因素纳入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模型,建立起电子民主研究的政治心理学模型,则会使研究者更容易进退自如^[22]。比伯所主张的选择论在相应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数据支持。齐诺斯和诺伊的研究发现,在工具性模型中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很弱,而在政治心理学模型中这种影响效果要更为显著^[23]。

电子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政治参与的机会,能否以及将会构建何种公共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依旧没有定论,可以明确的是,决定论在思想层面或应然层面论述电子技术与公共领域的关联时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理论想象力,选择论在社会层面或实然层面对电子民主的现实可能性进行验证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理论弹性。

然而,在分析电子民主与公共领域的关联时,如比伯一样将研究思路限定在工具型或政治心理型的框架之中是不合适的做法。这种研究方式不能为电子民主的研究带来新的创见,而只是在用已有的理论对电子民主进行修补。基于此,我们提出“公共知识”这一概念,对电子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做新的理论阐释。我们认为,新技术变革给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协商所带来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共知识。

何谓公共知识?用通俗的话来说,即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社区网络中所有信息文本都将汇集成为公共知识。此种知识的公开性,通过群体压力实现知识的相互监督,从而赋予知识分享更复杂的民主价值。公共知识这一概念可为媒介化的参与式民主提供理论补充。电子民主所昭示的参与式民主的媒介化,不仅意味着以新媒介技术为手段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其理论价值还在于为参与式民主提供一种媒介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参与主体及其行为既是一种媒介符号,又产生“露天广

① 参见 Zizi Papacharissi,同上。

场”上的群体压力。参与者通过对话可以获取知识或分享知识,同时此番获取或分享行为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知识为他人所知,进而形成“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同时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的现象。在此种情境下,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便产生了一种“知识间性”。在公共讨论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因阶层不平等、先天性智力差异等因素而形成的话语权力支配关系对公共理性和协商精神构成威胁。这种“知识间性”则可以为消解此种威胁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它有利于公共讨论的秩序形成和共识产生,从而有助于参与式民主。林肯·达尔贝格对明尼苏达电子民主项目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公共知识”理论提供某种证据支持。他发现,认真构建和严格实施网络规则,可以使社群之间的公共讨论围绕着主题展开,并促使参与者证实其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发表意见。尽管参与者有时会有武断的主张,但他也发现参与者一旦加入公开讨论就愿意修正自己的立场。此种情况有助于明尼苏达人培养一种社区感,使参与者在回复他人意见时能进行将心比心地换位思考^①。

三、评估电子民主:实践中的威胁与机会

如何评估电子民主?我们认为,关键词在于民主。民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是那么信服的让人知道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以及如何操作化。但是它的意涵在观念上是明晰的。民主,小到社区公众,大到世界公众,能够在制度设计上使人们对自身的权利有明晰的把握。在电子时代,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电子民主所存在的威胁和机会。电子民主对现代民主生活的威胁主要在三个方面:

1. 电子民主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电子民主在技术特质上的去中心化对共识的形成,以及对公共决策是有损害的。比如在校园 BBS 上可以看到电子民主的简单雏形,当人人都能说话的时候,会发现人人都说不了什么;

2. 信息泛滥容易造成焦虑。这可从认知心理学上进行解释。回顾日常体验,当一个学生手中只有一本参考书时,他的学习效率是很高的,学习的积极性也是很高的;当手中有二三十本参考书,学习精力就容易懈怠;当手中有两三千本书时,就会丧失学习的勇气。在金钱、时间、资本等其他方面也同样存在此种信息焦虑的情况。这是一种规模焦虑。当信息规模达到足够大的程度,人们会产生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认知心理学上解释此种现象的发生原理是,个体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是有限制的,在规定时间内所识别或认知的东西是有限的。有这样一种限期法则:个体每天所能记住的物品或数字不会超过七个。一个人每天看七八个网站,这是可以消受的。但每天看七八十个网站却是无法想象的。新闻信息也是如此。当人们身边出现了泛滥的新闻信息时,容易对之产生放弃感。

放弃讨论、对信息的自我屏蔽等放弃行为乃是基于人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此种心理免疫机制会促使人们忘记不愉快的事情或痛苦的经历,从而让人们恢复正常的心理平衡。人们对信息也是如此,会故意屏蔽某些信息,以使自己获得心灵平静或自主性。如人们在看电视时若被广告轰炸,经常会采取调台或做其他事情的方式来躲避泛滥成灾的广告。这种行为在英语中叫做 zapping,可将它翻译为“噪避”。这个词意即对噪音的躲避。在网络营销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发现,人们在面对大量网络广告的侵扰时,已发展出一种能力,会关闭自己的心灵已免受干扰。也就是“视而不见”:看着广告,但当之完全不存在。但这种能力需要久经训练才能发展出来,对经常经受信息噪音骚扰的人才有可能存在。同时,这种人还在性格上还应具有惧怕打扰的特征。

将上述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功能用于对电子民主中公共讨论的解释,可以设想:当公民在面

^① 转引自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第 146—147 页。

对海量的公共信息时，有可能会产生无力感从而放弃公共讨论。生理学家的研究揭示，所有人在现在的文明时代都有一种假死现象。当人们在遇到危险时会产生应激行为以抵抗威胁。然而，当人们遇到重大危险时则会丧失此类应激行为，甚至完全放弃抵抗。这种情况是一种生物学本能。在丛林中，放弃应激“装死”也是一种好的自我防护。还有一种情况也符合此种现象，当你读到一本好书时，有可能拿笔写下自己的评论。当读到一本书写得非常好时，你会放弃评论，以免自己的思想过载。这都可称为“规模屏蔽”。当信息达到一定规模时，你会关闭自己的心灵窗口避免过载。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世界里，很多人会用“假死”来防范信息过载，致使讨论的效率变低。

哪种人能在海量信息面前不会放弃公共讨论？我们认为有两种人，一种是无知无畏型。这种人所知甚少，虽然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但他所知甚少，也不会惧于发言。他们往往是网络讨论中的“哄客”。这就是为什么初中生在互联网上比博士生更愿意发言的原因。在互联网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发言，他们总是谨言慎行；第二种是处理复杂问题和信息很强的人。他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界世界能够掌控所有信息并给出足够明智的回答。互联网上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充当着信息世界的弄潮儿和向导。

3. 动机不纯的问题。民主作为理想的制度设计是用于人们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共讨论而达成决策。但公共利益是由所有的个体利益寻求公约数而构成的。但所有个体的利益未必能够顺利通约。因此，在民主讨论中往往存在着争议。争议既可来自个体利益的争辩，也可来自群体利益和阶层利益的争辩。若在民主讨论中，不同个体、群体或阶层各执一端，将大大降低民主讨论的效率，甚至使讨论误入歧途。网络审判的由来便与此相关，网络愤青也因此可以一统天下。在外界信息杂乱不一时，声音最大的人往往占有优势。但声音最大的人未必是最正确的。这便是网络公共讨论的吊诡之处——最后占优势的意见未必是正确合理的意见。此种情况在网络中经常出现。尽管如此，网络公共讨论的秩序仍然需要捍卫。由此，网络民主的现实困境便在于：人们捍卫网络民主，但网络民主并未为社会做正确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为何有时候网民又是正确的。我们承认网民们具有宏观智慧，但又强调网民正确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是有区域限制的。按照大数定律，一个群体规模的讨论或群体行为的路径和方向应该是这个群体的智力平均数。换句话说，以中人之姿展开的群体讨论具有的智力优势是强大的。这种智力优势在讨论低专业性的议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的，但在讨论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的议题时，网民的智力就难以得心应手。如面对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网民的讨论就显得极为苍白，往往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陷入到极端的情绪宣泄之中。

可见，由于动机不纯，网民各执己见，网络公共讨论易出现议题失焦，宣泄情绪，从而损耗公共讨论的效率，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精英的呼吁就会强烈。但过度的精英化也是对民主的损害。迄今为止，人们对民主的想象还没有结束，就现实政治来说，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虽非最优的理想民主设计，但也是次优的现实民主设计。

对电子民主作明确评判是非常困难的，如上所述，电子民主面临着许多威胁，但也存在着机会。在网络空间中确实有知识的融合和空间的聚集，形成了虚拟“咖啡馆”和“广场”，赋予公民以话语权；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有助于公共讨论，产生宏观智慧；网络社会交往将改变传统的社会关系，凸显弱关系的重要性，形成规模意义上的强关系，增强个体的社会资本，为大国治理中的电子民主增强潜能；网络空间的群聚性能够通过群体压力让公共讨论更具有“知识间性”，形成公共知识，助益于公共讨论秩序和共识的形成，促进电子民主。上述这些威胁和机会让我们对电子民主的未来依然难以判断。这不意味着可以将电子民主扔进故纸堆，任由历史的车轮往前滚动。电子民主的理论魅力不仅在于其批判性，更在于其现实建构性。在众多电子民主论者的推动下，美国和欧洲国家建立了多元的电子民主实验项目，有效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现实不足，提升了公众政治参与积

极性,并为培养理想型的公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电子民主项目多有政府强力驱动,带有很强的宣传意味和形式性,公众参与度不高。专家对于电子民主与社会资本、公共领域的相关智力成果与实践项目之间未能形成很好的转化关系,不可不谓之憾事。在提倡此种智力转化的同时,我们也强调,学界现有关于电子民主的研究还需本土化,对于社会资本和公共领域等概念的移植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用其原初概念演绎出本土性的社会资本和公共领域概念,再以此论述其与电子民主的关联。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 张凤阳, 等. 政治哲学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3] 罗慧. 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 以“郭美美事件”为例[J]. 开放时代, 2012, (5).
- [4] 张欧阳. 网络民主研究综述及发展趋向[J]. 学术探索, 2013, (4).
- [5] 赵春丽. 电子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综述[J]. 电子政务, 2010, (4).
- [6] 金太军, 袁建军. 西方电子民主研究及启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 (3).
- [7] [美] 卡罗尔·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美] 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M]. 彭斌,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 [9] [英] 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任孟山,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 [10] 曹泳鑫, 曹峰旗. 西方网络民主思潮: 产生动因及其现实性质疑[J]. 政治学研究, 2008, (2).
- [11] 陶文昭. 论电子民主的两种取向[J]. 理论与改革, 2009, (3).
- [12] Zizi Papacharissi.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J]. *New Media Society*, 2002, (1).
- [13] 方金友. 西方网络民主的发展图景[J]. 国际论坛, 2013, (4).
- [14] Kraut, R., M. Patterson, V. Lundmark, et al.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9).
- [15] Jeanne, M. P., I. K. John. Hardwiring weak ties: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occupational communicaties and organizatioal chan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 (6).
- [16] 邹卫中. 自由与权力: 关于网络民主的政治哲学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 [17] Peter, L. Civic renewal and the commons of cyberspace[J]. *National Civic Review*, 2001, (3).
- [18] [美]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Rabia, K. P.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ploring the explanatory link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20).
- [20] Shan, D., M. Schmierbach, J. Hawkins, et al. Nonrecursive models us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Questioning whether time spent online erodes social capital[J].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2, (79).
- [21] Wan, Y. L., H. D. William. The “net” effect in politics: The “stop the overlay” campaign in Los Angeles[J]. *Party Politics*, 2003, (9).
- [22] Bimber, B.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merican: The search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1, (54).
- [23] Xenos, M., P. Moy. Direct and differential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and civic engagement[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57).

(责任编辑 刘传红)